

20世纪50—60年代少数民族诗歌 与中华民族意象建构

杨彬 段小曼

内容提要：20世纪50—60年代少数民族诗歌包含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人民领袖、歌颂新中国及民族团结，表达翻身解放的喜悦和作为新中国主人公的欣喜等主题。少数民族诗人以热爱祖国、维护民族团结进步的创作意识，自觉运用中华民族共同意象进行创作，通过意象的象征功能建构国家认同，凭借意象的情感联结功能激发中华民族共同情感，以“集体表象”为核心方法建构中华民族情感共同体。同时，少数民族诗歌意象融于中华民族意象并传承丰富中华文化的创作特色，孕育催生了当代红色诗歌经典。

关键词：少数民族诗歌 中华民族意象 情感共同体

意象通过具体物象表达抽象情思，以具象化形象呈现难以摹状的抽象情感。中华民族意象凝结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与共同情感，传承民族精神与价值理念，在对中华民族的具象表达中，唤起各民族共鸣，催生民族自信心与认同感。20世纪50—60年代，少数民族诗歌出现一波创作热潮，少数民族诗人紧随以颂歌与战歌为主基调的诗歌创作方向，运用中华民族意象进行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反映民族生活和文化心理的历史转变。在表征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太阳”、象征中华民族革命精神的“红旗”“红色”、指涉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长江”“黄河”等中华民族共同意象中，少数民族诗人表达了对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的深刻情感与拳拳爱国之心，体现了少数民族诗人为民族团结进步发声的创作使命与担当，参与并丰富了中华民族情感共同体的建构。

一 少数民族诗歌中的中华民族意象呈现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在长期的经济往来、文化互鉴融通与血脉相融中形成了共生的格局。在近代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展现出空前的团结与强大的向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团结与融合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的国家

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持续深化。20 世纪 50—60 年代的少数民族诗人大多在革命中成长,他们擅长运用中华民族共有意象进行诗歌创作,这些意象承载了诗人们鲜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彰显出他们热烈的爱国之情。

(一) 太阳:中华民族的向心力

政治抒情诗是 20 世纪 50—60 年代诗歌的主流形态,作为政治抒情诗中的典型意象,“太阳”成为领袖毛泽东的符号能指,具有强烈的政治指涉意义。太阳意象的广泛运用始于“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①,诗人们以太阳的热烈、阳刚之象来表现国人求变、革命与新生之意。20 世纪 40 年代,民歌《东方红》在陕北诞生:“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②太阳成为政治符号的象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语境中,太阳普照万物、驱散黑暗的自然属性,与民族新生对光明意象的集体情感需求高度契合。太阳是当代文学中最突出的意象之一,少数民族诗歌紧跟当代诗歌的步伐,大量运用太阳意象表达情感:如拉祜族诗人罗正康的《东方升起了太阳》(1956)、藏族诗人饶阶巴桑的《步步向太阳》(1960)、朝鲜族诗人金哲的《太阳城》(1962)等。少数民族“向太阳”的方式往往结合本民族文化,表达对领袖和国家的热爱。以傣族赞哈康朗英的诗歌《金纳丽在飞翔》(1960)为例:

多少个做梦的夜晚,/我曾经请求叭英借给我金纳丽的翅膀,/去把天空细细查访,/可是叭英欺骗我,/每次醒来眼泪总不干。//自从太阳照亮了边疆,/我们傣族人的生活,/胜过一切最奇妙的神话,/我凭着毛主席的洪福,/借来了金纳丽的翅膀,/从澜沧江边飞向祖国的心脏。^③

金纳丽、叭英分别是傣族传说中象征幸福的神鸟和主宰天地的神,但神未能实现傣家人鸟瞰祖国山河的心愿。直到“太阳”毛主席照亮边疆,现代化深入傣寨,飞机取代神鸟,傣家人才得以圆梦。

彝族诗人吴琪拉达写道:“没有受过苦的人,/不知道毛主席的大恩情。”^④中华民族共同经历的苦难催生了人民对于光明的集体向往,在集体情感的召唤中,太阳既喻指领袖毛泽东的光辉与能量,也象征着在人民领袖的引领下,各族人民迈向崭新的历史阶段。

(二) 灯塔:引领中华民族成长

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歌曲《跟着共产党走》中,“灯塔”就有了政治象征的内涵:“你是灯塔,/

^① “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郭沫若、闻一多、艾青等诗人广泛运用太阳意象入诗。如郭沫若的《太阳礼赞》、闻一多的《太阳吟》等,太阳意象与“五四”时期文化革新、思想革新、以及民族新生的内涵紧密相联。参见陈绪石《论中国新诗太阳意象的时代性》,《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1 期。

^② 李有源作词,李焕之编配,金巍改编《东方红》,金巍主编《颂歌献给党:建党百年百首歌曲集》(上),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21 年,第 6 页。

^③ 康朗英:《金纳丽在飞翔》,中央民族学院汉语文学系民族文学选编组编《少数民族诗人作品选(1949—1979)》,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0 年,第 21—22 页。

^④ 吴琪拉达:《没受过苦的人……》,《奴隶解放之歌》,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 年,第 75 页。

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①灯塔在现实中的功能是在黑暗与迷雾中为航船指引方向，这与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领导作用高度同构——中国共产党如灯塔一般，指引中华民族冲破黑暗、迎向光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迈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持续发挥灯塔的作用，为中华民族指明前进方向，灯塔成为各民族人民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意象符号。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创作了《狂欢之歌》(1959)，以蒙古族赞歌的形式讴歌中国共产党：“赞美我们/功勋显赫的/英雄的党！/……/在前进的道路上/她是永恒不灭的/红色的灯塔，/……/我们英明的党啊/有力地掌握着/金质的缰绳，//万众一心的/各族人民/奋勇前进！”^②诗人把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国共产党比作号兵、旗手、灯塔，体现其引领性特质。缰绳掌握行进方向，是灯塔内涵的补充，象征中国各族人民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团结一致奋勇前进。从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的“我把党视若灯塔，奉为舵手，是她指引着我生命的航程”^③、克里木·霍加的“党啊，你是我前进道路上的灯塔”^④等诗句的表达中可以看到，各民族诗人都共同建构着“灯塔”意象的内涵，表达对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情感认同。

(三) 红旗：中华民族革命精神与信仰的象征

“红旗”意象的革命属性与象征内涵源于近代以来的民族解放运动，其生成过程与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历程具有一致性。“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⑤，红旗最初作为战场上的符号，承载着中华民族为实现解放所共同经历的奋斗与牺牲的集体历史记忆。纵览中国新诗，尤其是红色经典诗歌，红旗是非常重要的意象。库尔班阿里、克里木·霍加、巴·布林贝赫、金哲等少数民族诗人都有革命经历，在他们书写的大量红色诗歌中，常运用红旗意象来歌颂无产阶级革命与爱国主义精神。

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的《妥依》^⑥(1950)书写了红旗下各民族工人和农民组成的无产阶级队伍，“当红旗在朔风中飞舞的时候，/参战的队伍汇合成浩浩荡荡的洪流，/……/怒火焚毁了魔鬼的殿堂，/胜利揭开了崭新的历史”^⑦，他们从受压迫者变成革命者，探索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道路，红旗象征中华儿女投身革命的决心与无产阶级必胜的信心。革命胜利后，各族儿女在妥依上庆祝胜利，彰显出中华民族历史是由各民族共同书写的、伟大的革命精神是各民族共同

① 沙虹：《跟着共产党走》，王立平主编《百年乐府——中国近现代歌词编年选(1902—1949)》，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8年，第327页。

② 纳·赛音朝克图：《狂欢之歌》，《红色的瀑布》，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03、116页。

③ 铁依甫江：《祖国，我生命的土壤》，王一之译《铁依甫江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04页。

④ 克里木·霍加：《柔巴依》，张越编《克里木霍加诗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4页。

⑤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7页。

⑥ “妥依”是维吾尔语 toy 的音译，意为喜庆、喜事或婚礼。参见铁依甫江《妥依》，王一之译《铁依甫江诗选》，第24页。

⑦ 铁依甫江：《妥依》，王一之译《铁依甫江诗选》，第23页。

培育的内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红旗意蕴进一步丰富,土家族诗人汪承栋的《工作组礼赞》(1960)、藏族诗人伊丹才让的《引路人》(1962)等文本中都有红旗意象,“永远作第一线上的红旗,/你们的志愿比朝霞瑰丽;/在你们辛勤工作的时刻,/西藏,已跨上超越历史的快马,/飞向新的世纪”^①,诗歌将红旗内涵拓展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排头兵精神,把无所畏惧、勇毅前行的革命精神化作鼓舞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昂扬斗志。

(四)长江、黄河:凝聚民族认同的标志

长江、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分别孕育了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自古便是中华文明的象征。随着民族意识觉醒,《黄河大合唱》在民族危亡之际诞生,通过黄河喻示抗日战争中各民族命运与共的关系,以黄河雄浑的力量激发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决心和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当代诗人蔡其矫的《川江号子》、邵燕祥的《黄河》等诗歌,以长江、黄河赋予社会主义建设与变革的时代意义。少数民族诗人也参与到长江、黄河意象的建构中,蒙古族诗人巴·布林贝赫的《团结之歌》(1959)称颂道:“无尽的长江,由一支支的溪流汇成,/浩瀚的沙原,由一颗颗的砂砾聚成,/伟大的祖国,由各个民族组成。”^②诗歌以长江汇流的自然意象隐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把长江、黄河塑造为民族团结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意象符号,表达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欣喜,抒发身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自豪感及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东乡族诗人汪玉良的《在隆昌河边》(1962)揭示了黄河意象的深刻含义:“啊!让我在这激流滚滚的河畔,/用洮河的名义问一声你好!/我的隆昌河,我的裕固兄弟啊,/你使我幸福,使我骄傲!/昨天,我们还相隔遥遥,/没有姓名,实在难以寻找;/今天,我们却同声涌进黄河巨涛,/在祖国的胸膛上欢唱奔啸!”^③由于历史上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历代的反动统治者从不承认东乡人、裕固人是两个民族,诬称他们为‘咕啦’、‘黄番’”^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国家层面认可少数民族,消除了历史上遗留的对少数民族的侮辱性用语。《在隆昌河边》描述了东乡族、裕固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到了正名与认可,诗中的洮河、隆昌河、黄河分别代表东乡族、裕固族和中华民族,洮河、隆昌河共同汇入黄河,象征与表达了东乡族与裕固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喜悦。长江、黄河的意象体现了少数民族诗人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展现了少数民族诗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学实践。

二 基于中华民族共同情感的少数民族诗歌意象建构

少数民族诗人运用中华民族共有意象进行诗歌创作的自觉,根植于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

① 汪承栋:《工作组礼赞》,《高原放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第38页。

② 巴·布林贝赫:《团结之歌》,丁师灏、陈乃雄等译《生命的礼花》,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年,第32页。

③ 汪玉良:《在隆昌河边》,《汪玉良诗选》,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35页。

④ 同上。

忆、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性以及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少数民族诗人参与中华民族意象建构的文学实践,展现了他们对国家与民族团结的深层思考,在多民族文化背景下,诗人们自觉肩负起弘扬民族文化与维护民族团结的使命,以自身创作传承并丰富了中华民族意象的内涵。

(一)民族、国家命运与共:以国家符号为纽带建构国家认同

刘大先指出:“当代中国的国家观念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对于自我与世界的内外观念”^①。对于国外民众而言,中华民族就是中国,即中华民族是指国族意义上的现代民族,与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等同。^②近代以降的革命、民族解放、社会主义建设等一系列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运动,是由中华民族共同参与的,兼具政治属性与中华民族共同记忆。因此,中华民族意象与中国国家符号在某种程度上有重合的共性,诗人以具体的意象类比国家、民族的共同属性,来彰显抽象的国家认同。

以国家符号凝聚想象,使其成为集体性的观念,对于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借助国家符号,‘个体—共同体’间实现联结,并得以调动起个体对共同体的想象”^③。国旗、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国家符号,既有政治功能,也以强调“我们”的方式,使个体建立共同体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将中华民族的革命历史、革命英雄人物与国家政治中心和政治权力紧密相连,以权威性的国家话语唤醒各民族的共同记忆。纳·赛音朝克图、汪玉良、康朗甩等许多少数民族诗人都写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同题诗,展现中华民族命运与共的革命历史记忆。人民英雄纪念碑以伟岸的形象喻指中华民族伟大不朽的革命精神,在历史记忆维度上,以广泛认同的符号调动个体对国家的共同情感,既是意象“观物取象”同态对应的深切认同^④,也体现少数民族文学的凝聚力与动员力。

首都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政治象征,因而成为各民族想象新中国、认同中华民族的重要意象。傣族诗人康朗甩的《孔雀呀飞向北京》(1958)、白族诗人张长的《从澜沧江眺望北京》(1959)、朝鲜族诗人金成辉的《我最向往北京》(1961)等诗歌,体现少数民族民众积极且迫切地了解新中国的愿望。如张长的诗歌感叹道:“从滇东的坝子到滇西的峻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谁不想着你呵,北京!”^⑤虽然不能在物理距离上抵达北京,人们也要通过飞向、眺望、想念等方式,把个人对幸福向往的“意”转化为对集体与国家认同的“意”,并通过首都这一国家符号表现出来,从心理层面缩短所在地区与北京之间的距离,在空间对望中完成民族与国家关系的诗意建构。

① 刘大先:《边疆自觉、少数民族文学与当代中国观》,《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② 参见杨鹏飞《中华民族形象:基本涵义、理论类型与构建策略》,《探索》2024年第3期。

③ 刘春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符号认同进路》,《青海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

④ 中国意象论以传统的气论为基础。意象起于“观物取象”。“取”不是单纯摹仿,而起于物我之间因生命之气的交流共鸣而感应互通,是基于同态对应的深切认同。参见汪裕雄《意象探源》,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32页。

⑤ 张长:《从澜沧江眺望北京》,《凤尾竹的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5页。

(二) 民族团结的共鸣: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使命担当

民族团结与繁荣发展是各民族的共同心愿。为民族团结进步发声是少数民族诗人自觉的创作使命。诗人们在诗歌中建构了大量象征民族团结的意象。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的《心里的话》(1955)宣示了旧社会民族压迫决不能分裂中华民族共同情感的决心:“可我们决不能因对刽子手的仇恨,/就涂污整整一个民族的史册。/……/而我们从来就把哈萨克叫作亲人,/汉民族也把我们亲昵地称作弟弟……”^①“亲人”“弟弟”等亲缘意象阐释了各民族源远流长的手足亲情。1956年,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的汉译诗集《幸福和友谊》出版,该诗集的同题诗书写了各民族在那达慕大会上庆祝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场景:“不知是哪一位姑娘,/嘹亮地唱起了/‘多任朱格托亚尔拉’^②,/工人弟兄,也用那浑厚的歌喉/合唱起了‘东方红’。”^③两位诗人的诗歌互相呼应,见证了中华民族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团结大家庭。各民族语言虽然不同,但都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了共同的社会主义道路。《幸福和友谊》这本诗集的命名,正是各民族兄弟般情谊的高度概括,展现了中华儿女相濡以沫的幸福生活图景。

(三) 中华文化的交响:少数民族意象融于中华民族意象的内涵展示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诗人用中华民族共有意象进行诗歌艺术表达,并将少数民族意象融于中华民族共有意象,传承和丰富了中华文化。佤族诗人包玉堂说:“文艺民族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学艺术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④很多少数民族诗人受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深刻认同中华民族的历史与价值观。少数民族诗人喜爱用本地区动植物等意象入诗,如“鹰”“缰绳”“乳”“牛羊”等意象经常出现在蒙古族诗歌中,这些意象在汉族、藏族、哈萨克族等其他民族诗歌中也很常见。凤凰作为百鸟之王,在傣族象征权力与神性,傣族诗人波玉温的《彩虹》(1961)以凤凰意象表达为国家舍生取义的精神。其他民族诗人也以凤凰意象入诗,郭沫若的《凤凰涅槃》,以凤凰涅槃象征中国的再生,朝鲜族诗人宋祯焕的诗歌《祖国》(1962),也用凤凰涅槃寓意新中国的诞生。少数民族诗歌意象与中华民族共有意象相融,体现了中华民族意象的共同性,揭示了各民族都归属的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各民族都为传承丰富中华文化作出了独特贡献。

少数民族诗人把充满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意象与中华民族意象相统一,丰富了中华民族意象的立体度与多样性,进一步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包玉堂强调:“没有个性,便没有共性。浓郁的地方色彩与鲜明的民族特点,是诗的艺术生命的要素之一。”^⑤民族色彩是少数民族诗歌

① 铁依甫江:《心里的话》,王一之译《铁依甫江诗选》,第62—63页。

② 蒙古语,意为“东方红”。参见纳·赛音朝克图《幸福和友谊》,《幸福和友谊》,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第5页。

③ 纳·赛音朝克图:《幸福和友谊》,《幸福和友谊》,第5页。

④ 包玉堂:《诗坛学步二十五年》,《文艺报》编辑部编《文学:回忆与思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16页。

⑤ 同上书,第117页。

的鲜明特色,多元的民族意象承载着少数民族的情感、思想以及智慧,它们与中华民族共有意象统一,在不同民族的诗歌意象中来回穿梭,不断激发少数民族的爱国情感,表达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团结友爱、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彰显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性,增强中华文化的活力与生命力。

三 中华民族意象凝聚力与文学经典培育

20 世纪 50—60 年代少数民族诗歌中的中华民族意象体现了少数民族诗人对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身份认同的建构,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情感共鸣。这些意象传承和丰富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少数民族诗人为当代诗歌经典作出的突出贡献,有助于从文学角度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以及少数民族诗歌成为红色诗歌经典的时代原因。

(一)以中华民族意象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为中华民族情感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土壤与集体记忆。湘鄂边区由土家族和苗族组成的红军队伍、冀中平原的抗日回民支队、辽沈战役的内蒙古骑兵师,都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革命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并肩作战,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念已在各民族心中生根发芽。“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①,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具有情感联结功能的意象有助于维系庞大的共同体情感。情感共同体既可以是基于血缘、地缘等自然性的情感联结,也可通过共同经历、共同信仰与共同利益等抽象要素得以塑造。^②对共同历史与文化的传承有助于共同体内成员互相理解与依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根基。诗歌通过意象激发情感共鸣,对促成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尤为显著。汪玉良的《红旗》(1959)写道:“红旗唤起我们崇高的豪情,/也教我们牢记革命的艰辛!”^③红旗意象已超越其原始能指,其情感内涵需置身历史革命情境,才能深刻理解中华民族无畏牺牲、赢取胜利的共同经历。“红旗”“红色”“号角”等意象是各民族共同建构革命文化的脉络,它们有助于打开各民族的情感开关,使人们回到历史现场,唤起共同的革命记忆,激发集体的爱国情感。

中华民族意象的集体主义精神促进与推动民族融合发展。“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现代民族和现代国家的认同的建构及其融合和统一,也需要一种全国性的力量推动。”^④农业合作化运动值

①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本),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页。

② 参见周永根《情感共同体的概念、特征与功能》,《湖南社会科学》2025年第4期。

③ 汪玉良:《红旗》,《汪玉良诗选》,第6页。

④ 董迎春、覃才:《少数民族“新民歌”创作与现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生成》,《广西民族研究》2020年第2期。

此拉开帷幕,各民族在同一时间参与全国性的集体劳动,呈现出各民族互帮互助的大融合局面。社会主义集体劳动赋予人们激情与力量,彰显出国家强大的凝聚力,就如朝鲜族诗人李旭描述的那样:“六亿人民干劲强,/要在人间造天堂,/长江黄河佩银带,/昆仑天山赛娇娘。”^①浅白通俗地歌颂了中华民族在团结一致的集体目标中所展现出的昂扬向上与奋发图强的强国精神。

(二)以“集体表象”建构中华民族情感共同体

少数民族诗歌以“集体表象”为核心方法,以少数民族诗人相似的情感态度与书写意象所展现出的“递相沿袭性”^②以及“阐释共同体”^③的逻辑一起建构起了中华民族情感共同体。涂尔干(Durkheim, E.)指出,集体表象(现)源于社会成员“心灵的关联”^④,因为社会是“从融合中形成的所有个人的特性”^⑤，“形成社会的个体心灵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构成了集体表现”^⑥。集体表象理论旨在阐释一个社会所共有的象征体系可以超越个人意识,让复杂变得容易理解,情感借此得以固定,由此能以强烈的团结意识把社会成员塑造成一个共同体。^⑦少数民族诗歌中的中华民族意象并非由某一个民族或诗人独立构建,而是基于各民族的共同经历与社会心理,合力建构出了热爱领袖、拥护中国共产党、向往社会主义新生活等共同情感,并逐渐达成一种审美共识。这些意象通过反复的文学书写与传播,使个体情感升华为公共性的象征符号,让集体记忆不断再现,成为广大读者可共同感知、阐释与内化的审美对象。如回族诗人木斧在诗歌中所写的那样:“我们,中华的儿女,/生长在苦难的中国,/曾经在这块土地上战斗,/……/为了迎接共和国的诞生,/我们不吝惜流尽鲜血。”^⑧共同的历史记忆成为维系中华民族情感的核心纽带,各民族诗人反复书写太阳—领袖、红旗—胜利、长江与黄河—民族团结等意象内涵,使不同的象征符号组合成更具凝聚性的象征系统。分散的意象以重复性、互文性、共同性为经纬,逐步构建起有明确指向性与强大凝聚力的象征网络,以引领和调动情感的方式,在民族团结话语下唤醒各民族读者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情感认同,并促使他们自主参与到中华民族情感共同体的建构之中。

涂尔干认为,抽象的实体很难作为共同体成员强烈的情感来源,“只有把它们和我们能够

① 李旭:《可爱的祖国》,《我握着毛主席的手(兄弟民族作家诗歌合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312页。

② 诗人有感于现成意象的意义和习惯用法而创造新作品的特征,称为意象的递相沿袭性。参见陈植锷《诗歌意象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64页。

③ 社会主义文艺遵循“由谁创造,由谁阐释”的阐释原理,这就决定了“人民”作为社会主义文艺“阐释共同体”的本体意义。“人民”作为“阐释共同体”,拥有共同阐释策略和明确阐释目标,允许内部存在差异,内含价值与规约,提供意义标准,发挥解构与建构功能。参见谷鹏飞《“人民”与社会主义文艺阐释共同体的建构》,《文学评论》2022年第3期。

④ 涂尔干:《社会学与哲学》,梁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5页。

⑤ 同上书,第26页。

⑥ 同上书,第24页。

⑦ 参见马敏《序:我们生活在一个“真正的真实”的镜像社会之中》,《政治象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2—13页。

⑧ 木斧:《爱我们的祖国》,《缀满鲜花的诗篇》,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41页。

真真切切地意识到其实在性的具体事物联系起来,我们才能够向自己对它们作出解释”^①。具有沿袭性的意象内涵可以激发集体情感,使集体精神永续存在。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稳固结构确保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的稳定性,有助于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身份的认同。不同时代的读者在共同的情感结构与阐释策略下理解与阐释同一套意象系统,以持续的参与感从具体的“象”中感知国家不可分、民族不可散这一抽象的“意”,逐渐构建起共同的情感依赖,凝聚成跨时空的情感共同体,意象符号由此促成了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代际传承。中华民族意象不仅是文学审美对象,还是连接个体与集体、历史与当下的重要情感媒介,是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诗人与读者以诗歌为载体自觉建构中华民族情感共同体的介质,在“集体表象”的核心象征机制中,使“民族—国家”突破制度层面的范畴,成为“精神—价值”^②维度的认同实在。

(三) 中华民族意象孕育催生当代红色诗歌经典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围绕提高文化原创能力,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孕育催生一批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构筑中华文化的新高峰。”^③20世纪50—60年代的少数民族诗人以服务人民为使命的责任感与担当,表现出强烈的集体意识,他们以大众化、民族化的艺术创作建立审美标准,始终致力于推动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诗歌创作以浅易却内涵深刻的中华民族意象孕育催生了一批深入人心的当代红色诗歌经典。

中华民族意象所指向的中华民族精神,是当代红色诗歌经典生成的土壤,诗歌中传达出的共同体意识是少数民族红色文学经典的重要内容。中国的红色诗歌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和追随中国共产党的进步作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一种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核心的诗歌形态”^④,少数民族诗人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长起来的写作队伍,他们自觉运用中华民族意象,歌颂中华民族休戚与共、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书写艰苦奋斗、互帮互助的社会主义建设精神。朝鲜族诗人任晓远在《给我一支枪》(1950)中写道:“只要身上还有一滴血,/我就战斗下去决不下战场。”^⑤展现了少数民族人民保家卫国的决心。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的《给恋人的一封信》(1951—1954),书写了民主改革时期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解放的喜悦之情。中华民族意象既诠释了红色政权的来之不易,也昭示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

① 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0页。

② 涂尔干认为,任何社会共同体,小到部落、族群,大到阶级、民族、国家,都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物理”意义上的实在,同时也是一种“精神—价值”意义上的实在。参加马敏《序:我们生活在一个“真正的真实”的镜像社会中》,《政治象征》,第15页。

③ 新华社:《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 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光明日报》2024年10月29日。

④ 李遇春:《“人民史诗”与百年中国红色诗歌》,《长江文艺评论》2022年第2期。

⑤ 任晓远著,紫荆译《给我一支枪》,金学泉主编《中国朝鲜族文学作品精粹 诗歌卷》,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2页。

卓越的艺术追求与高格的审美标准是构成文学经典的要素之一,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经典来说,人民性是其核心特质。少数民族诗歌总体上呈现出人民性的美学特征。蒙古族诗人查干曾援引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歌,阐明其诗歌创作宗旨:“谁是诗人,谁就得前进, / 千辛万苦的和人民在一起。”^①诗人们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文艺路线,“人民”是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内在动力。库尔班阿里感慨道:“是党给了我智慧,是毛主席给了我尽情歌唱的权利,我的诗歌永远是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永远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服务的。”^②少数民族诗人积极响应《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书写少数民族革命斗争、翻身解放、社会主义建设等主题,彰显出人民性的社会主义美学色彩。

从史学价值来看,20 世纪 50—60 年代的少数民族诗歌在文学史上经得起反复阐释。文学史以其筛选功能呈现出具有一定审美价值、时代价值、文化传承价值和研究价值的文学作品。四川大学、复旦大学等 22 所高校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③论述了少数民族诗歌特色。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将 20 世纪 50—70 年代的少数民族诗歌比作“新中国多民族大合唱中的不同声部”^④,是民族大团结的象征。洪子诚、刘登翰编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⑤,肯定少数民族诗歌是中国当代诗歌的重要构成部分。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的《狂欢之歌》(1959)、巴·布林贝赫的《心与乳》(1953),藏族诗人饶阶巴桑的《牧人的幻想》(1956),维吾尔族诗人尼米希依提的《无尽的想念》(1956)等诗歌作品反复出现在文学史中。这些诗歌表现了旧时代的苦难与人民的新生,传承革命精神、歌颂爱国主义情怀,从中可以管窥 20 世纪 50—60 年代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整体面貌。

中华民族意象是新诗本土化的写照,开创了少数民族红色诗歌的经典范式。从中国新诗诞生以来,诗人们在吸收中国古典文化、民间文化以及借鉴西方文化中不断探索新诗的发展道路。洪子诚、刘登翰指出,20 世纪 50 年代,少数民族诗歌为同时代汉语诗歌写作注入两大活力:题材的开放和想象力的丰富^⑥。晓雪强调,少数民族诗人应“批判地继承本民族的优秀遗产和文学传统,从而创造出有自己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社会主义新诗歌”^⑦。少数民族诗人弘扬少数民族诗歌传统,在追随政治抒情诗的主流外,还创作了大量的劳动爱情诗、长篇叙事诗,把民族观、国家观融入诗歌创作,诗中的“人化”“神化”意象兼具浪漫主义气质与社会鼓舞效应。饶阶

① 查干:《真正的诗人》,《彩石》,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 年,第 85 页。

② 库尔班阿里:《致汉族读者》,赛比哈孜、常世杰、尤素夫·赫捷耶夫译《从小毡房走向全世界》,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 年,第 1 页。

③ 参见二十二院校编写组编《中国当代文学史》(第一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 年。

④ 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158 页。

⑤ 参见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⑥ 同上书,第 33 页。

⑦ 晓雪:《在学习与写诗的道路上》,《文艺报》编辑部编《文学:回忆与思考》,第 429 页。

巴桑《牧人的幻想》(1956)很有代表性,以早、晚“太阳”意象作对比,寓意旧时代人民绝望的心境和中国共产党带来的新生。藏族的文化思维与浪漫主义创作手法相结合,其民族色彩自然融入中华民族意象,能迅速调动情感共鸣,是中国新诗本土化的缩影,突破了同质化、类型化的创作风格,为当代红色诗歌经典注入活力。

结 语

少数民族诗人的成长历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步,他们受到红色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现代化教育的熏陶,培育出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感。20世纪50—60年代少数民族诗歌以中华民族共有意象为载体,深刻表达了少数民族诗人的家国情怀,彰显中华民族在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下唇齿相依的紧密联系,是少数民族诗人自觉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承中华文化的文学体现。将少数民族意象融于中华民族的共有意象中,不仅传承、丰富了中华文化,更使中华民族意象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情感、激发爱国情怀的精神符号。纵观这一时期少数民族的诗歌创作,诗人在共性中展现着个性,在中华民族的宏大叙事中呈现少数民族特色,建构的诗歌意象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不仅以文学的方式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且开创了当代红色诗歌的经典范式,为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更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与启示。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少数民族红色文学经典的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编号:23BZW175)阶段性成果。

(杨彬,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段小曼,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叶昕昀】